

# 《清明上河图》 ——中国古代城市智慧的结晶

葛剑雄

参观过中国馆的人无不对那幅会动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其实，“会动”的技术含量并不很高，在世博园里，比那幅图更会动，动得更复杂的展品还可以见到不少。《清明上河图》固然气势恢宏，但与沙特阿拉伯馆中的超大 3D 屏幕相比，那幅图的尺寸还相差甚远。而《清明上河图》真正吸引人的，还是图中的场景所显示的宋代开封丰富的城市生活，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的智慧。

随着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展，中国的城市历史正在不断改写和上溯，发现古代城市遗址的范围也从黄河流域扩大到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。早期历史文献中一些有关城市的记载，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。

由于夏、商、周三代实行分封制，每座城几乎都是大小不等的国。国的数量越来越多，以至有“万国”之说。直到春秋初（公元前 8 世纪后期），有记载的国还有 1000 多个。尽管这些国名义上都从属于王和上级诸侯，但都有一定的独立性，所以无不将行政功能置于首位。一般来说，一座城中最重要的部分必定是主宰该城的诸侯或贵族的宫室，同时也是该城的行政和祭祀场所。城的四周一般围有城墙，有的还有相应的防卫工事。由于人口稀少，土地富余，城的范围可以划得很大，城内不仅有手工作坊，还可能农田。相比之下，普通居民的住所和活动场所反而显得微不足道。

用今天的眼光看，城市内部这样的结构和功能并不合理，却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，也体现了当时人的智慧。对每座城的居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生存和安全。这些都离不开君主和城墙的庇护，二者在城中占主要地位是顺理成章的。

自秦朝以降，中央集权制度越来越巩固，城市的政治功能和等级制度也越来越明显。以西汉为例，全国 1500 多座城被分为首都，郡、国（诸侯国），县、侯国（列侯的封地）、道（设置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）、邑（皇后、公主等的封邑）这三个等级，逐级管辖。每座城都设有政府机构，都筑有城墙，宫殿（或衙署）与城墙成为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主体。

西汉的长安城是在秦朝废墟上新建的城市，事先就有严格的规划。长安城的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，但城内的主要部分是宫殿，长乐宫、未央宫、桂宫合计约 12.6 平方公里，加上衙署、仓库、兵营、监狱等设施，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面积供百姓居住。由于城内容不下众多的官员、贵族，他们大多居住在长安附近新建或扩建的“陵县”（因皇帝的陵墓而设置的县）内，以至形成了一个人口比长安还多的城市带。

东汉首都洛阳城的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，城内的南宫、北宫等宫殿占地约 4 平方公里，再除去衙署等建筑，留给居民的地方大概也不过三分之一。

首都以下的城市不需要那么大的宫殿，但作为地区性的行政中心，相应的衙署和其他行政、军事机构也会占较大面积，居民能享受到的设施很有限，城市生活的质量很低。

在一个农业社会，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，离不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。除了本来就住在城里，或不得不住在城里的皇帝、贵族、官吏、将士、商人、工匠等，其他人往往选择乡居，因为城市对他们并无多少吸引力，城市生活未必比农村生活更美好。

东汉末年开始的分裂割据，以及期间反复出现的饥馑、战乱使原有城市受到很大破坏，但一些新因素也导致了城市的进步。例如，各个政权为了增强实力，在城市建设中更讲究实效，避免形式。原有宫殿毁坏，或者没有能力建造新的宫殿和衙署，民居在城市中所占比例相应增加。人口流动增加了移民，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。佛教传入后，寺庙成为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，首都与大城市中往往形成特殊的景观。

以北魏洛阳为例，据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，“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”。“自葱岭以西，至于大秦，百国千城，莫不欢附，商胡贩客，日奔塞下，所谓尽天地之区已。乐中原土风，因而宅者，不可胜数。是以附化之民，万有余家。门巷修整，闾阎填列，青槐荫陌，绿树垂庭，天下难得之货，咸悉在焉。”这种新气象，恰恰是以往的首都城市所未见过的。

唐朝的首都长安已经兼顾了城市的不同功能。

长安城由外郭城、宫城、皇城和各坊、市等构成，面积达80多平方公里。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，各坊分布于宫城、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，东西两市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，东西对称。整座城市规划整齐，布局严密，规模宏大，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。外郭城平面呈长方形，周长36.7公里。皇城也呈长方形，周长9.2公里。城内有南北向大街11条，东西向大街14条，两侧都设有排水沟。其中5条干道宽百米以上，特别是朱雀街宽达150米，两侧沟宽3.3米。这些街道将城内分为110坊，各坊建有坊墙、坊门，坊内为居民住宅、宫衙、佛寺、道观等。寺观遍布各坊，建筑豪华壮丽，有的占有全坊之地。著名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就建在慈恩寺和荐福寺内。西市南北长1031米，东西宽927米，东市面积大致相同，两市都筑有围墙，市内店铺、作坊密布，商业繁荣。3条渠道将河水引入城内，以满足宫苑和景观用水，并汇成曲江池等风景名胜。

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、人口最多、设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，但封闭性结构还是影响了居民的生活，

也限制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，这些局限要到宋代才得到突破。结合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描绘和文献记载，包括首都开封在内的城市在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。

发达的商业、手工业、服务业使经济发展迅速，民众获得实利，生活水准提高，并且突破了城墙的限制，扩大到近郊。当时不少城市都在城外形成新的市场。南宋时，杭州的商店和市场不断向城外扩展，以至城外部分超过了城内部分。

道路、河流、桥梁、津渡形成便利的水陆路线，将各地的人员和物资引入城市。农村与城市间的交流频繁而密切，每天形成熙熙攘攘的人流。

流动人口迅速转化为移民，城市人口增加，人口的素质提高，多种文化相互竞争，形成新的城市文化。娱乐方式和设施名目繁多，餐饮等服务业应有尽有，佛寺、道观众多，城市居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得到享受。

中外史学家都认为，宋代的经济文化水准达到了新的高度，民众的生活富裕而舒适，社会繁荣而稳定。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城市人口及以城市为生的人口大幅度增加，商业和服务业扩大，城市生活水准提高。这些都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得到反映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不愧为中国古代城市智慧的结晶。

因此，尽管在宋代以后，首都等大城市依然沿袭了封闭性的政治中心的传统，但在经济发达地区，“清明上河图”的模式长盛不衰。如明清的江南，以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镇，以天然河流和人工运河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，以精细农业和商业、手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复合经济，形成了崭新的城市和城市生活。

近代上海的崛起也得益于江南，上海人口的一半以上来自江南。由于这些移民熟悉商品经济和市场，迁入上海后如鱼得水，推动经济、文化蓬勃发展，使上海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性都市。

可见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成为中国馆的亮点绝非偶然，因为它正体现了“城市使生活更美好”的主题。

# 上海里弄住宅的来世今生

孙施文

上海的里弄住宅，曾经占据了上海城市住宅的半壁江山。对于出生于1990年代之前的上海人来说，绝大多数都有在里弄中生活的体验。在此意义上说，里弄不仅形塑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基底，也构成了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，并进而铸造起上海人的性格和精神特征。

里弄住宅，是缔造上海上一次辉煌的基础，也是近代发展史的见证。曾几何时，弄堂里的故事华丽地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多少的事件、多少的人物，甚至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走向。里弄里的生活，不只串连起上海这个城市发展的轨迹，而且也是上海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，回荡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构筑起外人的惦念。

随着上海的再一次奋起，大量的里弄住宅快速地消逝了，成为了无可挽回的旧影。20多年来，成片成片的里弄地区，伴随着上海的快速发展和烟消云散了。

里弄，也许是真的老旧了，那些还留存着的，也还继续地老旧着，等待着命运未决的未来。为了留住作为城市特色重要表征的里弄住宅地区，政府规划划定了24片历史保护街区，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有效举措，实质性地带来两大后果：一是保护区之外的里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地需要拆除，然后进行新的建设，被保护的街区就有可能成为城市中的孤岛；二是保护区内的里弄住宅处于过度使用、缺乏有效的维护和更新，已经呈现出加剧衰败的颓相。

里弄住宅，既是历史的结晶，也积淀着历史的负担，

但历史的厚重将当今的城市建设推到了进退维谷的状态。一方面，城市之根、城市之魂需要延续，但其原先属于富裕中产阶级的生活空间，进而成为社会主流的居住场所，现在更沦为社会中低收入人群的集聚地和代名词。另一方面，多少人渴望着上海这个城市能够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世人面前，因此急切地期待对这些老旧的住宅地实行摧枯拉朽般的大扫除，而当这样的动作难以施行之时，便将其置于不被顾及的自生自灭的状态中，等待着彻底的沦丧而为未来的全面清理准备条件。而这一切发生之时，恰恰又是“老上海”、“旧上海”梦时尚的弥漫之时，甚至流变为一种意识形态——即使是在讨论国际大都市、世界城市这类愿景的时候，也仍然念念不忘拿出“老上海”、“旧上海”的场景来渲染一下曾经的辉煌与对未来辉煌的憧憬，精神的割裂已至如此地步。

“新天地”的出现，曾经被认为是对里弄住宅的活化使用，但其对人口和功能的置换实质上还是对里弄住宅再次消费，甚至还只是借用了其中一些符号而已。惊艳一瞥，留下的却是更为沉重的打击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打上了唯此一途的印记。田字坊虽以不同的方式，走不同的道路，但居民自主性和渐进式的更替，仍然无法避免对里弄住宅功能的消解，甚至制造出与住宅功能的对抗。这种以功能改造和替换为主要方式的再利用，确是里弄住宅生存方式的一种，但很显然可适用的地段非常有限，再大的大上海也无法支撑起全面的仿照，因此也就无法为更大地域的里弄住宅区的更新提供样板。

也有设想将里弄住宅恢复到最初的使用方式，从而实现“中产阶级化”（gentrification）。但由于从1950年代开始沉积下来的产权严重分割，任何可用的举措都必然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，也需要有无穷尽的繁复的讨价还价，而随着城市土地和房产价格急剧上升、动迁安置的高额回报之后，住房质量的下降和无限上升的期望之间的矛盾使

得可能的操作陷入无解。即使在种种压力下，可以采用试点的方式实现一两个街坊的更新，其结果也只能是通过人口替换而形成新的豪宅地区，但也同样无法为更为广大的地区更新作出示范。

上海近30年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建设，只留下恢宏的动拆迁和用密集的高楼大厦来替代的记载，没有为里弄住宅的全面改造提供任何探索的机会和点滴的经验，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。难道，对于成片的、更大范围的里弄住宅而言，再无其他出路，只能由此走向末路？里弄住宅只能面向死亡或者等待死亡吗？当上海这个城市，不再有里弄住宅存在，或者只留下一些商业区中的建筑样式或极少量的里弄豪宅作为点缀，这还能叫做上海吗？城市之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

一个城市，当作为人民生活承载的住宅不再能凭借自身而不断生长、修复，而只能依赖于外来的强力而被摧毁，并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来承载的时候，这个城市的自生长、自修复能力已经或将近被消失殆尽，城市就成为了一

个物理体，而不再具有生命与生命力。

一个城市，当其内生的力量已经无法发生、无法成长的时候，这个城市还能凭借什么底蕴而存在于世界又区别于世界？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有关于里弄住宅的问题，而是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所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，并需要为未来发展重新奠定基础的问题。

里弄住宅确实已经老旧，确实需要改造，但需要改造的不只是其物理环境，更需要织造其生长和修复的机制。就现有里弄住宅地区的改造而言，尊重历史已经形成的产权状况，设计一套有助于市场交易的产权制度，并结合当代金融手段的运用，从长计议，激发现住居民的自组织改造的热情与能力，才有可能解开里弄住宅地区改造的死结。

城市是居民的家园，而家园最为首要和实在的部分应当是居民的居住地。里弄，至今仍然是部分上海市民的居住地，而且也是更为广大的上海市民的家园，无论是物质上的，还是精神上的，这是上海未来发展中必须慎重掂量的。